

# 唐代江西地区胡人活动考述

梁 琼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系 南昌 330022)

**摘要:** 唐代江西地区活动着一批以胡商为代表的胡人, 这成为当时较突出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形成, 既与唐朝文明开放而中国境内胡人活跃相关, 又与江西社会稳定、交通地理优越、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较为繁盛等因素相关。胡人在江西的生产、生活, 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江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 胡人; 江西; 唐代; 经济; 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93.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0)04-0089-06

## On the Activities of Hu People in Jiangxi in the Tang Dynasty

LIANG Qi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a group of Hu people represented by Hu merchants in Jiangxi in the Tang Dynasty, which became a prominent social phenomenon. The form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wa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activities of Hu people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ivilization and opening in the Tang Dynasty,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social stability, advantages of traffic and geograph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especially the flourish of commodity econom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production and activities of Hu peopl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and advance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e of Jiangxi.

**Key words:** Hu people; Jiangxi; the Tang Dynasty; economy; culture

在唐代,“胡”不仅指传统上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中国域外异族(尤其是西域的印欧人种诸族),而且用来称呼波斯、大食、天竺、罗马等中亚、西亚、东南亚以及西方的民族(国家)。有唐一代,胡人在中国境内活动极其活跃,活动区域几乎遍及唐朝全境,影响很大。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唐代“胡”(“胡人”)的研究卓论频出,然对于江西<sup>①</sup>“胡”问题则缺少必要的关注。除偶有论著提及江西地区曾有胡人活动的事迹外,迄今未见研究者予以专门论述。笔者不揣谫陋,利用有限的文献资料,基于唐代胡人在江西活动的现象,着重探讨这一现象形成原因以及胡人活动对江西经济文化的影响,以抛砖引玉。

① 本文的“江西”(江西地区)系指唐代洪、饶、江、吉、虔、抚、袁、信八州,其境域与现代江西相近。

收稿日期:2009-12-29

基金项目:2009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江西古代佛道关系研究”(编号:zj0901);江西师范大学青年成长基金项目“唐代江西笔记小说整理与研究”

作者简介:梁琼(1975-),女,江西万载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献学。

查检正史《旧唐书》、《新唐书》,难见有关唐朝时期胡人在江西活动的直接资料。然在反映唐代社会历史的一些笔记小说<sup>①</sup>、地方史志中,则不乏胡人在江西活动的记载。如《太平广记》就有五则直接记载胡人在江西活动的资料。其一,卷374《胡氏子》:额头上长一球状物的洪州(今南昌市)胡氏子,以经商为业,家境丰赡,某日于城市遇一胡商。胡商“知其头中有珠,使人诱而狎之,饮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其二,卷402《李灌》记,经常停驻于洪州建昌县的李灌,某日倚舟于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悯其将尽,以汤粥给之。数日而卒。临绝,指所卧黑毡曰‘中有一珠,可径寸。’将酬其惠。及死,毡有微光溢耀。灌取视得珠。买棺葬之,密以珠内胡口中,植木志墓。其后十年,复过旧邑。时杨凭为观察使,有外国符牒,以胡人死于建昌逆旅,其粥食之家,皆被桎讯经年。灌因问其罪,囚具言本末。灌告县寮,偕往郭墻伐树,树已合拱矣。发棺视死胡,貌如生,乃于口中探得一珠还之。”其三,卷403《紫茸羯》:唐乾元年间,云间令录事参军李惟燕主管征调洪州财赋时,“有一僧人,请率百万。乃于腋下取一小瓶,大如合拳。问其所实,诡不实对,惟燕以所纳给众,难违其言,诈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当不违价。’有波斯胡人见之,如其价以市之而去。胡人至扬州,长史邓景山知其事,以问胡。胡云:‘瓶中是紫茸羯。人得之者,为鬼神所护,入火不烧,涉水不溺。有其物而无其价,非明珠杂货宝所能及也。’……瓶中有珠十二颗。”其四,卷404《岑氏》:临川人岑氏,得宝石二枚,结于衣带之中。“后至豫章,有波斯胡人,邀而问之‘君有宝乎?’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求以三万为市。岑虽宝之而无用,得钱喜,即以与之。以钱为生资,遂致殷赡。”其五,卷441《閩州莫徭》:閩州莫徭因好心救一老象而得到一支象牙,“载到洪州,有商胡求卖。累自加值,至四十万。寻至他人肆,胡遽以苇席覆之。他胡问是何宝,而辄见避,主人除席云‘止一大牙耳’。他胡见牙色动,私白主人。许酬百万。又以一万为主人介绍。佯各罢去。顷间,荷钱而至。本胡复争之云‘本买牙者我也。长者参市,违公法。主人若求千百之贯,我岂我耶。往复交争。遂相殴击。所由白县,县以白府。府诘其由,胡初不肯以牙为宝。府君曰‘此牙会献天子,汝辈不言,亦终无益。’胡方白云‘牙中有二龙,相踞而立,可绝为筒。本国重此者,以为货,当值数十万万,得之为大商贾矣。’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并进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龙筒”。

以上五则有关胡商(或称“商胡”)的故事,表明了如下事实:(一)胡人在江西洪州从事宝石、象牙等贵重物的交易活动,交易的对象既有一般的汉人,也有少数族“莫徭”;与胡人交易者既有世俗人士,也有出家僧侣。(二)《莫徭》条提到“胡肆”,说明洪州有专门的胡人生产生活的场所。(三)江西已贯彻了朝廷保护胡商的政策措施。如《李灌》条提到,波斯胡病死于建昌逆旅,官府为之追究死因。又《閩州莫徭》条提到“长者参市,违公法”的问题,据《大唐六典》卷20“两京诸市署”条“凡买卖不知而榷固,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若参市者而规自入,并禁之。”其中“若参市者而规自入者”自注云“谓在傍高下其价以相惑乱也。”“参市”是有违商人伦理的行为,受到唐代法律的严格禁止。这个规定适用于在唐朝境内所进行的一切商业贸易活动,无论是中国商人还是外国商人。在这个故事中,“本胡”就是以“参市”为由指责“后胡”有违公法的。<sup>[1][P318]</sup>说明唐代洪州有专门管理胡商的人员或机构,对胡人提供必要的保护。

据《资治通鉴》卷237记,唐代宗大历六年(771年),粟特商人以回纥的名义要求唐朝廷允许在荊州、越州、扬州、洪州等地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以奉摩尼教。众所周知,唐代摩尼教,信仰者主要为西域粟特人,其寺院一般建立在粟特人活动频繁的中心区域。江西洪州成为当时摩尼教寺院的建设地

<sup>①</sup> 对于唐代小说家之言,陈寅恪先生曾这样评述过“小说亦可参考,因其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文载《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当今治唐史者,一般都把《太平广记》等笔记小说视为重要而珍贵的资料来源。

之一,说明粟特胡商或者粟特移民在江西活动的人数当有一定的规模。

胡商除了活动于洪州外,也活动于江西的其他地区,特别是重要的交通线上,大食、波斯等国商人从广东、福建等地纷纷来到江西进行商贸活动。如《文苑英华》卷371 沈亚之《表医者郭常》及《饶州府志》卷24《人物志》均载“(唐)有波斯、安息(伊朗)人自闽转估经饶。”时有一波斯商人在鄱阳经商时染重病,“历请他医,莫能治”。鄱阳人郭常前去诊治,妙手回春,月余病愈后的波斯商人要以五十万钱酬谢,郭常分文不取。

江西除了有胡商活动外,也有从事其他职业的胡人。如唐朝赵璘《因话录》卷6“羽部”载:洪州“优胡”(表演杂技的胡人)曹赞,“长近八尺,知书而多慧。凡诸谐戏,曲尽其能。又善为水戏。百尽檣上,不解衣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茵席。又于水上靴而浮。或令人囊盛之。系其囊口浮于江上,自解其系。至于回旋出没,变易千状。见者目骇神辣,莫能测之。”这位技艺高超的水上艺人曹“优胡”,当是来自于中亚地区,胡族曹姓正是北朝隋唐时期中亚康国一带的著名大姓。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有唐一代,有一定数量的以胡商为主的胡人在江西地区生产、生活,且已成为比较活跃的群体。总体上江西人对胡人亦表现得相当友好。

## 二

江西属吴头楚尾,非沿边沿海之地,偏离唐朝边境及其统治中心关中、中原,与各胡人原本生活地相距遥远。江西之所以较为频繁地出现胡人活动的踪迹,是唐朝文明开放的胡族政治与江西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

唐朝文明开放,在长期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家富强,政治经济文化富于“世界性”的特色<sup>[2]</sup>,这些都吸引着无数国家和地区的商人来到大唐进行经济贸易,朝廷贸易与民间贸易都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唐政权的皇室李氏,有浓厚的胡族血统,染有浓厚的胡风;唐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允许合法的胡族入境居住与生产生活、通婚联姻、参政做官。这一切都使胡人在唐代中国极其活跃,以胡商为主体的胡人不断深入中国内地营生谋利,足迹遍及中国,他们不仅活跃于长安、洛阳、成都、扬州等大都市,就是在一些偏远的山乡野村也若隐若现,江西地区自不例外。当然,唐代江西地区胡人活动较为频繁,除了上述国家层面的因素外,还在于本区有诸多吸引胡人的因素。

其一,开放、包容的地域文化。江西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接纳四方,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兼容并蓄,不断丰富着文化内涵”。<sup>[3] (P16)</sup>众所周知,先秦时期的江西地域文化,就不断接纳与融合中原、荆楚、吴越、岭南等地文化,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赣鄱文化。<sup>[4]</sup>自汉代中国与域外接触以来,江西也就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不断接纳域外文化。汉魏六朝时期,江西地区就有胡僧较为频繁的活动。如大约东汉末年,安息(今伊朗)僧人安世高就来到江西弘传小乘佛法;东晋隆安年间,天竺僧昙显来到豫章西山,刺史胡尚舍宅请居,名“崇胜院”。在唐代文明开放的大背景之下,正处于对外开放重要的起步阶段、又居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前沿地带的江西,对于“胡”抱着相当开明的态度,宽容、接纳、友善,这从前述江西人与胡人交往的故事,略见一斑。

其二,稳定的社会环境。唐朝自建立以来,江西地区的社会就比较稳定并发展。“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期间,江西地区与全国一样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安史之乱发生后,当北方陷于政治混乱、经济衰退、统治秩序不稳定时,江西地区仍是中国少有的稳定区域之一。《全唐文》卷427 于邵《送王司议季友赴洪州序》:洪州“自幽蓟处奸,加之以师旅,十年之间为巨防焉。……当闽越奥区,扼关重阻,既完且富,行者如归”。江西事实上成为唐中后期政权稳定与巩固的重要支撑之一。《全唐文》卷661 白居易《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称“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所系。”同书卷775 李商隐《上江西周大夫状》曰“国用取资,终赖江、湘之入。”

其三,优越的地理交通。处于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本来就有“衿三江而带五湖,控荆蛮而引瓯越”的优越地理形势,随着隋代从东都洛阳到余杭大运河的畅通、唐开元年间大庾岭通道的全面拓通,江西

地区在全国水陆道路交通网中已居于重要地位。而大运河与大庾岭道是胡人经常往来的要道。例如,大庾岭道是连通岭南与中原地区的最便捷路线。唐代番禺(今广州市)是与海外经济交流的最重要港口之一,《全唐文》卷291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称“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这种功能的实现,主要依赖于江西地区的道路交通。南海及南亚地区特产的香料药材正是由广东进口上岸,沿北江溯流至韶州,又经陆运过大庾岭,复由章江入赣江,经鄱阳湖,东下长江,折入运河而达京都的。

其四,经济进步特别是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自六朝以来,江西地区的经济就呈蓬勃发展之势,<sup>[5] (P157)</sup>已有和胡人进行商贸往来的迹象。传为东晋陶潜撰著的《搜神后记》卷5载“豫章人刘广,年少未婚。至田舍,见一女子,云‘我是何参军女,年十四而夭,为西王母所养,使与下土人交。’广与之缠绵。其日,于席下得手巾,裹鸡舌香。其母取巾烧之,乃是火浣布。”这位自荐枕席的女子姓何,为昭武九姓之一;裹鸡舌香,手巾材料为火浣布,这些都属西域特产;而她又自称居于西方的西王母之女,凡此种种,都暗示了此女子来自西域。<sup>[6] (P277)</sup>发展到唐代,江西已是中国新兴的经济区,不仅是瓷器、茶叶、粮食、药材等物品重要产地,而且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成为各地商人尤其是长江流域商人竞相活动之地。<sup>[7] (P5-7)</sup>史称“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由是越人、吴人、荆人、徐人,以其孥行,络绎渐至大江而之涯。”“宏舸巨鹢,舳接舳隘。輶车鸾鑣,轳挂轂击。”<sup>[8] (P4102)</sup>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大历、贞元间的女商人俞大娘,“航船最大……开巷为圃,操架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大,此则不啻载万也”。《敦煌零拾》载《长相思》词三首,其一:“作客在江西,富贵世间稀。终日红楼上,频频爱着棋。满满酌醉如泥,轻轻更换金卮。尽日贪欢逐乐,此是富不归。”其二:“作客在江西,寂寞自家知。尘土满面上,终日被人欺。朝朝立在市门西,风吹泪点双垂。遥望家乡肠断,此是贫不归。”其三:“作客在江西,得病臣毫厘。还往观消息,看看似别离。村人曳在道傍西,耶娘父母不知,身上缀牌书字,此是死不归。”这三首词分别描写了三个敦煌商人在江西生活的不同情形,从侧面反映了唐代江西都市繁荣与商业的发展。江西已成为当时长江中游商业的中心地区之一,是其区域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洪州城地处长江中游,水陆四通,为扼国内交通兼有外商来往的著名商埠,号称“江淮之间一都会”。<sup>[9] (P3251)</sup>杜牧《怀钟陵旧游》诗云“连巴控越知何有,珠翠沉檀处处堆”,“控压平江十万家,秋来江静镜新磨。”杜牧《中丞业深韬略志在功名,再奉长句一篇兼有谏劝》诗云“橈似邓林江拍天,越香巴锦万千千。”韦庄《南昌远眺》描绘“南昌城廓枕江烟,章水悠悠浪拍天。芳草绿遮仙尉宅,落霞红衬贾人船。”这些都充分表明洪州是连接巴蜀、吴越与岭外商业贸易的枢纽。《全唐文》卷389独孤及《江州刺史厅壁记》称“江州城‘襟江带湖,据三江之口,当四达之衢,七省通连’;”同书卷689符载《江州录事参军厅壁记》亦说“江州航运地方千里,江涵九派,缙钱粟帛,动盈万数,加以四方士庶,旦夕环至,驾车乘舟,叠轂联橈。”显然,江州城已是长江中游著名的物资集散地。这一时期的饶州、吉州、抚州等州城,虽比不上洪州、江州,却也是商贾辐辏、百货云集的区域名城。如唐人张保和《抚州罗城记》盛赞:“临川古为奥壤,号曰名区,翳野农桑,俯津闾阖。北接江湖之脉,贾贷骈肩;南冲岭峤之支,豪华接袂。”<sup>[8] (P8626)</sup>可见当地商人往来之频繁及商品经济的发达。值得一提的是,唐代胡商所经营的物品也往往是质高价高能获取高额利润的珠宝、香药等奢侈品,他们活动在江西境内,表明本区的经济水平特别是商业经济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江西的活动以胡商为主,表明经济原因是胡人在江西活动的基本动力。事实上,胡商在江西可发财致富。据《太平广记》卷403《紫茸羯》载,唐肃宗时两京粮饷不继,江淮度支使大征包括洪州胡商在内的财赋,“胡乐输其财而不为恨”就是明证。

此外,宗教因素也是胡人在江西活动频繁的原因之一。唐朝对宗教传播总体开放,外国各种宗教的僧侣都可以进入唐境。除前述唐代江西是摩尼教的重要基地外,它更是中国禅宗的盛化之地:创立了著名的洪州禅,以及禅宗五家中的沩仰宗、临济宗和曹洞宗。由此不仅吸引了中国大江南北的僧侣纷纷赴江西,形成“选官至长安,选僧至江西”的繁盛气象,也使海外的诸多僧侣络绎不绝地求法于江西。如唐代中期,日本僧人瓦室能光曾在宜丰住十三年,向洞山良价学习禅法;朝鲜僧利严于洪州真如寺向云居

道膺学习曹洞宗法 朝鲜僧明照安师从良价弟子匡仁,住持奉新百丈山“新罗国禅宗初祖”的元寂道仪及实相洪直、桐里慧彻均师从洪州马祖道一弟子西堂智藏。这些海外僧侣虽然超凡脱俗,学界一般也不把这些东亚僧侣当“胡”看待,但他们毕竟来自唐境之外,也不免带来了不少的“胡气”。

总之,唐代江西地区社会稳定,地理交通条件优越,经济繁荣、文化生态文明开放,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吸引了胡人不断进入江西活动。

### 三

有唐一代,胡人在江西地区的活动,不仅加强了江西与胡地的经济文化往来,而且对本区的经济文化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唐代江西产品拓展出了新的市场,茶叶、瓷器等特色商品开始不断输向边疆、海外。当时江西地区8州中即有袁、吉、饶、江、抚、洪、虔等7州产茶,茶的质量也较好,成为对外重要的商品,浮梁地区成为长江中游茶叶的集散地。<sup>[10]</sup>西域、吐蕃民众纷纷饮用江西茶叶。敦煌出土文献《茶酒论》谈到:浮梁、歙州(婺源)茶“万国来求”。洪州窑是唐代六大窑口之一,江西瓷器“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sup>[11]</sup>,成为向海外出口的重要物品。1975年,在扬州西门外发现了唐代扬州“罗城”遗址,并发掘了一大批陶瓷器残片,其中陶瓷产地可辨有景德镇窑,可能的还有洪州窑。广州是唐皇朝对外贸易的中心,瓷器是当时最主要的出口商品,而“广州的瓷器出口仰给于洪州”<sup>[12]</sup>。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余干县博物馆共同发掘了黄金埠中晚唐青瓷窑址,出土各类窑具和青瓷器达3000余件,其中有一件青釉瓷腰鼓。腰鼓又名拍鼓,原为西域少数民族的一种打击乐器。余干黄金埠窑址发现的瓷腰鼓是中国与中亚、西亚各民族进行经济与文化频繁交流的实物见证。

唐代江西的佛、道文化发达,也影响到胡人地区。佛教方面除了前述影响到日本、朝鲜两国外,还影响到东南亚。如百丈怀海弟子无言通,于820年南下入安南(今越南),住北宁仙游建初寺,开始传授百丈禅法,创立无言通派,后成为越南禅系的主流。此外,胡人敦煌地区也有江西佛教的传播发展。如敦煌写本有一篇反映洞山良价立愿割舍尘缘、辞亲出家的诗偈——《先洞山祖辞亲偈》(S.2165):“不好浮荣不好儒,愿乐空门舍俗徒。烦恼尽时愁火灭,恩情断处爱河枯。六道戒定香曳引,一念无生惠(慧)力扶。为报北堂休怅忘(惘),譬如身死譬如如。”道教方面,江西道教在胡人极其活跃的敦煌地区有所传播。敦煌出土文书有一些反映江西道教的诗文,如唐中后期人李翔的《涉道诗》,其中有献龙虎山张天师诗,诗曰“东汉天师直下孙,久依科戒住玄门,囊中有位逢皆拜,世上无人见不尊。三洞吏兵潜稽首,六宫魔幻暗销魂,可能授以与长生策,浩劫铭肌敢忘恩。”此外,李翔《涉道诗》还有咏南昌西山、南城麻姑山的篇章。《许真君铁柱》:“恐老蛟重作患深,独埋铁柱至今。根牢直下蟠江底,势壮长留镇郡心。神鬼每闻趋夜后,风雷不敢犯塘阴。无因更走横泉窟,压断祈精气永沉。”《题麻姑山庙》:“险翠峨眉压上游,大仙曾向此幽求。云埋三级坛空在,月照千寻水自流。偃盖鹤还清露滴,古池龙睡碧莲秋。桑田未必翻为海,香火何人解继修。”这些都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江西道教在胡人活跃的敦煌地区有一定的传播。

由于胡人在江西地区的活动,“胡风”有所流行,丰富了本区的经济文化生活。除了上述胡人对江西杂技和艺术的影响外,胡族的音乐、舞蹈等艺术也在江西地区得到阐扬。“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在滕王阁的歌舞表演中,有不少胡歌胡舞。其中歌曲以伊州大曲最为流行,舞以柘枝舞最具特色。伊州大曲出自4世纪的伊州(今哈密),唐朝天宝年间由西凉节度使盖嘉运献于朝廷。由乐署改编教习后,便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得歌舞风气先的滕王阁经常上演伊州大曲。李涉《重登滕王阁》诗云“滕王阁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游。半是半非君莫问,西山长在水长流。”柘枝舞是唐代西北少数民族舞蹈,本出怛逻斯,传入京城长安,又流传全国各地。柘枝舞在江西地区比较流行,滕王阁上常常可见表演。太和初年,杜牧任江西观察使沈传师的幕宾时,常登阁游览和参加宴集,对滕王阁上跳的柘枝舞印象尤为深刻,遂写诗忆念。《中丞业深韬略,志在功名,再奉长句一篇兼有谏劝》诗云“滕王阁上

柘枝鼓 徐孺亭西铁轴船。”《怀钟陵旧游》诗亦云“滕阁中春绮席开 柘枝蛮鼓殷晴雷。垂楼万幕青云合 破浪千帆阵马来。”江西地区盛行胡歌胡舞 原因或许不一 当与胡人在江西频繁活动有一定关系。

唐代“胡风饮食”兴盛 胡人开设的饼肆非常普遍<sup>[13]</sup>。江西的饮食文化中也有胡族风习 如江西地区流行“胡饼”。《太平广记》卷384《阿六》载 宝应年间 饶州龙兴寺奴名阿六 从阴间起死回生之际 “逢素相善胡。其胡在生 以卖饼为业 亦于地下卖饼”。此虽属宗教故事 但却反映出当时胡人在江西地区经商卖饼的社会现实。又《古尊宿语录》卷1载 “师(怀海)参马大师(马祖道一)为侍者 檀越每送斋饭来 师才揭开盘盖 马大师拈起一片胡饼 示众云 ‘是甚么?’ 每日如此。”此外 受胡人饮食方式的影响 江西有的民众还食胡麻饭。《太平广记》卷47《冯俊》载:冯俊作佣工至庐山 即曾食用道士招待的胡麻饭。《全唐文》卷340 颜真卿《抚州临川县井山华姑仙坛碑铭》中叙述了盛唐时修道成仙的女道士华姑 称她“恒服茯苓 胡麻 绝粒四十余秋 年八十 齿发不衰”。

江西的建筑文化、雕刻艺术 也受到“胡”文化的影响。如江西境内现存唐代佛塔甚多 它们大多数为窠堵波式建筑 由台基、覆钵、平头、竿、伞五个部分组成 建筑形制又有单层式、多层式、楼阁式、密檐式之分。其中 敕建于开元年间(713-724)的西林寺塔 为庐山现存最早的楼阁式塔。塔为七层六面 楼阁式砖塔。底层南开拱形正门 门头题额“千佛塔” 二至七层分别题“羽宝林”、金刚幢、灵鹫来、无上法、听雨花、光明藏。西林寺塔的建筑风格与样式 无疑饱含着天竺气息。

此外 宗教信仰上 江西在宋元明时期成为中国摩尼教的重要地区 追本溯源 当与唐代粟特胡在江西传播摩尼教有一定关系。

总之 唐朝胡人在江西地区的活动已比较活跃 一方面是唐朝经济文化发展以及江西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 另一方面 又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本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六朝时期 江西地区虽然也与胡地有所往来 但基本是海外僧侣在江西的活动 还不见与胡地进行经济贸易的直接记载。因此 唐代是江西地区对外开放起步并快速发展的阶段 胡人无疑是其中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胡人在江西的活动及其影响 足见江西与海外的联系已大为加强 江西由此初步纳入了“世界”经济文化的范畴。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表明 唐代江西地区已进入到了经济崛起的阶段。

#### 参考文献:

- [1]李文才. 魏晋南北朝隋唐政治与文化论稿[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 [2]葛承雍. 论唐朝的世界性[N]. 深圳特区报 1998-08-24.
- [3]许怀林. 江西文化[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 [4]彭适凡 许智范. 赣鄱文化论[A].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赣文化——从大京九走向二十一世纪[C].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7.
- [5]周兆望. 江西通史·魏晋南北朝卷[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
- [6]王 青. 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7]陈金凤. 江西通史·隋唐五代卷[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
- [8]董 诰. 全唐文[O].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9]李 昉 等. 太平广记[O].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10]陈金凤. 唐代江西茶叶经济述论[J]. 古今农业 2005 (4).
- [11]权奎山. 陆羽茶经与洪州窑瓷器[J]. 文物 1995 (2).
- [12]陈为民. 试述唐代江西商业的繁荣[J]. 南方文物 1998 (4).
- [13]黎 虎. 汉唐时期的食肆行业[A].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史学论衡(3) [C].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戴利朝 黎 芳)